

曹大林\著

中国 传统 文化 探源

先秦儒墨法道比较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探源

——先秦儒墨法道比较研究

曹大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1 号

中国传统文化探源

——先秦儒墨法道比较研究

著 者 曹大林
责任编辑 崔文辉
责任校对 崔文辉

封面设计 尹怀远
版式设计 叶 子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1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42-4/K·107
定 价 28.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尹怀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儒家——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石	(12)
第一章 孔丘——中国封建社会传统 思想的奠基人	(16)
第一节 仁的提出——意识形态和思维 方式的一场革命	(20)
第二节 礼的变通——进行社会 改革的政治学说	(32)
第三节 学的倡导——中国封建社会 教育体制的创立	(52)
第二章 孟轲——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富有 人民性的思想家	(59)
第一节 “民为贵”——关于仁的思想的 崭新的内容	(62)
第二节 “仁者无敌”——以仁政统一天下 的政治纲领	(72)
第三节 “性善”论——实行仁政的理论根据	(86)
第四节 “万物皆备于我”——由“性善”论	

发展来的天道论	(94)
第五节 “求其放心”——儒家教育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和极端化	(102)
第三章 荀况——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108)
第一节 “性恶”论——荀子思想的理论基础	(110)
第二节 “明分”“正名”论——封建宗法 思想的完成	(119)
第三节 王霸论——儒法的接近	(131)
第四节 天论——儒家宗法政治（礼治） 的本体论	(134)
第五节 “知道”“解蔽”论——宗法政治思想 专制主义的认识论	(144)
第六节 “劝学”“修身”论——儒家教育 思想的完成	(151)
第二篇 墨家——儒家思想的畸形变种	(156)
第四章 墨翟——一位未成功的通天教主	(160)
第一节 兼爱非攻论——用爱维护统治阶级既 有秩序的政治乌托邦	(162)
第二节 尚同尚贤论——为维护既有秩序服务的 理想化的绝对专制主义	(167)
第三节 尊天事鬼非命论——建立专制主义的 普遍宗教的失败尝试	(176)
第四节 节用非乐论——同绝对专制主义 相为表里的社会观（历史观）上 的片面功利主义	(194)
第五章 后期墨家和墨家的没落	(203)

第一节	墨辩——中国古代名辩学的 独特成就	(205)
第二节	墨经中一些思想上的电光石火	(215)
第三节	墨家的消亡	(243)

第三篇 法家——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极为

重要的构成因素	(249)
---------------	-------

第六章 商鞅——法家理论和实践的

伟大完成者	(252)
-------------	-------

第一节	“不法其故”论——商鞅变法的 理论基础	(254)
-----	------------------------------	-------

第二节	“壹务”论——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	(259)
-----	------------------------	-------

第三节	“刑多赏少”论——商鞅变法的 主要手段	(265)
-----	------------------------------	-------

第四节	慎到和申不害——商鞅法治 理论的“补充”	(275)
-----	-------------------------------	-------

第七章	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顶峰”	(287)
-----	-----------------------	-------

第一节	“知臣主之异利者王” ——绝对君权论	(288)
-----	-----------------------------	-------

第二节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绝对专制论	(308)
-----	---------------------------------	-------

第三节	“听不参则无以责下” ——君权认识论	(313)
-----	-----------------------------	-------

第四节	“法术之士焉得不危” ——法家的历史悲哀	(319)
-----	-------------------------------	-------

第四篇 道家——中国传统思想的否定因素…………… (326)

第八章 “老子”——中国哲学思想的

正式起点…………… (329)

第一节 从人伦本位走向天道本位——中国

哲学思想的发端…………… (333)

第二节 从天命走向自然——中国唯物主义

世界观的滥觞…………… (338)

第三节 从善走向真——中国人对于认识

问题的初探…………… (350)

第四节 从中庸之道走向相反相成——中国

古代“辩证”思维的集大成者…………… (356)

第五节 从积极政治走向无为而治——中国

封建小农经济的最早的政治幻想…………… (361)

第九章 稷下道家——道家思想在认识论

方面的初步展开…………… (371)

第一节 精气说——对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372)

第二节 虚心应因说——对知的唯物

主义的解释…………… (277)

第三节 治心说——与儒家德治、仁政

学说的接近…………… (387)

第十章 庄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

否定哲学家…………… (393)

第一节 反绝对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思维向

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最深刻的挑战…………… (400)

第二节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道家

学说的完成…………… (426)

第三节 反压迫的政治学说——对阶级

	社会的批判	(440)
第四节	安贫乐道的处世哲学——对统治者 采取超然的不合作态度	(454)
第五篇（附篇）		(463)
第十一章	《周易》——中国先秦思想的没落	(463)
第一节	由人学到神学——儒家学说的堕落	(467)
第二节	由道学到形而上学——道家 学说的扭曲	(484)
后 记		(502)

前 言

一

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是指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封建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封建思想当然也形成于其时。前此的思想遗产大体上都被改造和吸收于封建思想中，成为其构成素材了。而且，在此之前的文献资料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我们探讨中国的传统的封建思想之源，只能只需只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本书名曰《中国传统思想探源》，其内容就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思想的形成。

二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公元前 221），虽然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正是这个时期，中国实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制度大变革——由氏族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宗法封建制社会。直到公元 1949 年，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新民主主义革

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国才最后埋葬了封建制度，实现了第二次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的辉煌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开创性的繁荣发展上。

实事求是地说，历经夏、商、周三代的中国奴隶社会没有创造出古希腊人那样全面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成果。但是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转变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充分展示思想文化创造力的机会，创造了可以同古希腊文化并立的古中国文化。这个机会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基。这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为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自周室东迁后，在整个华夏大地上逐渐形成了两股互相推动的历史潮流：土地的私有和政治权力的下移。到春秋末年，周朝那种以奴隶主氏族占有土地和奴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已经被掏空了，以奴隶主氏族的宗子为中心的分封式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从氏族奴隶主阶级中已经分化出一个采取新的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孔子慨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急速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正在取代旧社会的新社会，正在崛起的新的剥削阶级和政治势力要求否定或扬弃原来的为奴隶主氏族残酷剥削奴隶氏族服务的以天命论为理论基础、以血缘伦理关系为政治纽带的政教合一的严酷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思想专制主义，并为自己从理论上、思想上、舆论上开辟道路。这就为

思想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泛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思想和言论的相对自由为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固然是产生新思想、新文化的经济基础，但是形成一定规模和一定深度的思想文化运动，不仅涌现出多方面的大量的高质量的思想文化成果，而且塑造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是需要有一个相当宽松的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政治环境的，否则，新生的思想文化也会遭到窒息或扭曲。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4页）我认为古代希腊人正常发育的标志之一是在他们进入阶级社会后，在所谓城邦国家中没有出现政治上和思想（宗教）上的专制主义，在奴隶主和自由民内部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如此优越的政治环境以及一系列其他条件使希腊民族登上了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制高点，他们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一直到今天仍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否认的启迪作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体制上仍然是君主个人专制，没有雅典城邦国家那样的公民民主，但是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形势促使或迫使华夏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普遍放宽言路，给思想文化的发展以相当程度的自由，以致出现了政治专制和思想文化开放并存的一个千载难得一遇的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特有状况之所以出现，稍微展开一下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是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社会经济变革开展最早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大诸侯国，从原来氏族贵族奴隶主中分化出来的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一些政治集团夺取或控制了国家政权，前者如田氏代齐、赵魏韩三家分晋，后者如鲁国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共同控制国政。这些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

政治经济地位，击败传统政治势力的反扑，不得不争取在社会变革动荡中从原来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基本上没有“恒产”而专门从事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活动的士人这一新阶层的支持，不仅让他们出仕做官，参与政治实践，而且让他们从思想上理论上发挥指导作用，以使社会变革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平稳地进行下去。田氏代齐后，新的统治者甚至专门设立稷下学宫，聚集各种流派的学人自由发表议论，出谋划策，抬轿子固然好，政见不合，当面挨训也能宽容。孟子曾指着鼻子斥责齐宣王“四境不治”，直逼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有些诸侯国旧主未变，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不得不广泛征求并采纳士人、甚至是外来客卿的意见，主动进行改革。如秦孝公接受商鞅的政治主张，先后两次实行全国规模的变法改革。楚悼王也重用吴起，任为令尹，主持变法。其次是从春秋开始的、愈演愈烈的、战国时达到高峰的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迫使各国的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得不激烈地争夺人才和广泛地延揽人才。这一点可以说是更直接地造成和保护了士人们的言论和思想自由。一方面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互相间的人才、智力竞争中不敢轻易地镇压持不同政见的学人，另一方面一些学有所成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可以随意游历各国，发表政见，宣传学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除秦燕晋以外，周游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华夏国家，虽然屡遭冷淡，也颇受危难，政见当然也不能立即被接受，但发表政见、讲究学术大体上是通行无阻的，并基本上得到各国最高统治者的礼遇。他死后鲁哀公亲自发表悼词，尊称“尼父”，也可以说生荣死哀了。此后，儒、道、墨、法诸子无不到各国谈政说法，对统治者直接或间接进行指责，特别是孟子更是“说大人，则

藐之”（《孟子·尽心下》），庄子则直面魏王大讲“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庄子·山木》）总之，急遽的社会变革和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思想和说话的机会。纵观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可以说没有因思想言论而被治罪的，商鞅和吴起之惨死均因他们直接参加了激烈的政争。封建社会稳定下来以后，封建统治者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严酷的全面专制，知识分子又失去了说话和思想的权利，因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未能突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构筑的思想文化框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新的社会因素、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力量兴起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只能在封建的思想文化的樊篱内做量的积累，而不能有质的飞跃。第三点是华夏民族在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为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马克思恩斯选集》第3卷，404页）春秋战国时，华夏民族的天文、历算、地学、农学、医学以及文学音乐，特别是政治学、军事学和历史学都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不仅为那些相继崛起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提供了极其广泛的思想材料，而且也必然启示他们对这些素材做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概括。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几乎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例如孟子，他主要是政治思想家，但他在为自己的从人性善出发的仁政学说做本体论的论证时却明显地受到天文历算学的影响：“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这不仅说明当时中国天文学发展的水平和孟子知识的广博，而且说明长时期的文化积累对于孟子

这样的伟大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和卓越的抽象思维水平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总之，由于上述三个条件的成熟，华夏民族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思想文化全面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三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繁荣应是全面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属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历史文献基本上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甚至很可能有不少宝贵的成果并未形成文献。好在本书研究的内容只涉及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部分，且文学艺术尚不包括在内，论述评介的对象只限于思想。所幸的是，先秦留给后人的文献主要的也属于思想方面，相对来说，不仅丰富，而且成体系。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诸子百家围绕现实政治所展开的关于天人、古今、名实关系的探究和争辩已涉及到今天所谓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部门，如哲学、宗教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美学以及逻辑学等等，并且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系统。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西汉时已有诸子百家的说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即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所谓百家，说其多矣，并非定数。西汉末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把诸子百家按其源流及性质分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承袭了这一说法，并评论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

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瘠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班固的观点反映了公孙弘、董仲舒以来的汉儒的正统思想，在总体上并不正确。他所说的王道衰微实际上是社会大变革，历史大前进；而诸子百家（十家）的思想虽然离不开对所谓六经或六艺，即原有文化的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承受，但从本质上看却都是对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的扬弃或否定，激进如道家、法家者自不待言，连温和的孔夫子也要对周礼有所损益，连保守的墨翟也反对繁琐的传统礼乐制度，因而亦不是六经之支与流裔，不仅社会阶级属性有所不同，而且其深度、广度、高度，六经都是望尘莫及！但班固还是有说对的地方，一是诸子百家（十家）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二是各家之言虽然争辩激烈，大有不可同世之势，但又有其共同的争辩背景及争辩内容，甚至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不可或缺。

先秦诸子的辩论真是势如水火，在言论相当自由的政治条件下，他们相互之间的批判都够上纲上线了。墨子骂孔子“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墨子·非儒下》），行同叛逆；孟子斥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实为忤逆；均以破坏人间大伦相指责。法家和道家更是把儒墨统统看成人间的祸源。在每一学派内部也在不断分化，相互间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各学派之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荀子就曾大

义凛然地声讨其著名的先行者“子思孟轲之罪”（《荀子·非十二子》）。但是正是这种后人誉为百家争鸣的思想争论促使着先秦诸子不断从思想内容上、思维方式上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学说，使之精益求精。孟子曾一再慨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应该说如果没有激烈的辩论，孟子的性善论民本说或许就不能如此深刻和有说服力！终身处于辩说之中的孟子同缺乏辩论对手的孔子相较，无论在学说的具体性上还是在思维的逻辑性上都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如果说执著于政治的孟子还感到辩论的压力的话，善于辩证思维的庄子则深感同论敌辩难是不可多得的思想启示。“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垾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垾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庄子的话着实反映了春秋战国的时代精神。没有或不允许相反意见的辩难、论战或斗争，思想文化是不可能有力或发展的。相灭相生或相反相成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也是主观思想的辩证法。思想，哪怕是再伟大的思想，一旦失去了对立面，也就到此为止，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要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思想文化不断前进的伟大动力，也是思想文化丰富多彩，开创新天地的光辉表现。

百家也好，十家、九家也好，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形成，对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进程，真正发生历史影响并留下足够的可靠资料供后人研究的，其实只有儒墨法道四家而已。四家的学说几乎包括了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四家的思想斗争相应地也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四家之间、以至在